

李怡 段从学 肖伟胜 著

[illegibl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项目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

李怡 段从学 肖伟胜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李怡,段从学,肖伟胜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ISBN 7-5621-2708-5

I. 大… II. ①李…②段…③肖… III. 当代文学-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170 号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

李 怡 段从学 肖伟胜 著

责任编辑:康莉蓉

封面设计:王正端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400715

印 刷: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0 001~1 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字 数:216 千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21-2708-5/I·128

定价:18.00 元

引 论

大西南是一块令人百感交集、思虑万千的土地。在中国那漫长的历史上,它曾经一再被我们视作蛮夷之邦,首次标举“西南”之名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巴蜀西南外蛮夷”之云,《汉书·叙传》则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直到宋代,还有这样的概括:“西南诸蛮夷,重山覆岭”,“犵獠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①这些称谓和叙述都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偏远、荒凉和充满蛮性的大西南。从中原文化的视野来看,如此“犵獠之性”未除,当然就属于“化外”的“他者”了。只不过,当这些“化内”的“中国人”(《毛诗》注释云:“中国,京师也。”^②)以“别种”、“异域”来指称大西南时,也多少流露了他们对于这块遥远而神秘的土地的好奇心。因而,大西南的某些地区一直都对许多中国文化人产生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入蜀”、“下西南”简直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

① 二十四史·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3602页

② 十三经注疏(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548页

件,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在大西南的一些地区,也不断涌现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人,尤其是文学家,尤其是诗人。例如《宋史》就称四川是“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①元人虞集更云:“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备载简册,家传人诵,不可泯灭。”^②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四川夙产文士”。^③从陈子昂、李白到花间词派,从苏轼、杨慎到李调元、张问陶,从吴芳吉、康白情到郭沫若,从举世仰慕的文人创作到“蛮儿巴女”的民间竹枝,绵绵不断的诗情汇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诗的潮流。以四川为主体的大西南的诗情激荡和那络绎不绝、蔚为大观的外来的文人大军映衬在荒远、偏僻的地域背景之上,真让人有点惊异不已: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块土地,怎样的一种文化呢?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我们的新时期。如果说中国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促使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着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过渡,那么深居内陆腹地、现代工商业基础都相当薄弱的大西南又一次处在了历史发展的被动地位,这一被某些学者称为尚处于“后农业文化时代”的落后地区要迅速跟上现代化的步伐,显然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然而,经济基础的薄弱似乎并没有妨碍这一地域继续酝酿着郁勃的诗情。在新时期,大西南人的诗情不仅丰富热烈,而且其思维之活跃甚至大大地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里不仅有 50 年代的老诗人迅速汇入新时期的合唱,吟诵起了“归来的歌”,也不仅为我们的 80 年代诗坛贡献出了最具实力的“新诗潮”诗人,就是在中国新诗急速转入“新生代”的颠簸不平的轨道之时,大西南的反应也丝毫没有有一

① 二十四史·卷八十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 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见:道园学古录(卷 31)

③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文集(卷 41)

点的滞迟之象,我们甚至可以从大西南青年诗人的动向中找到中国新生代生成的最早的线索,这就好像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一偏远的地域诗人的活动中找到新时期诗歌到来的某些先兆一样。已经有众多的事实表明,大西南在新时期的经济现状完全不能说明它的文化发展的特殊景象,更难以解释其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空前活跃。如果说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动向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新时期经济运动的最激进的浪潮,那么大西南的诗歌动向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的最真实的缩影!这又是怎样的一块土地,怎样的一种文化呢?

所有的这些地域之谜和文化之谜都久久地吸引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认真地走近它们并作出切实的解答。这种解答显然主要不是对于某种地域文学的发掘,也不是抽象地“弘扬”某种地域的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还经常缺少面对世界的勇气的时候,在我们的现代化工程还需要经常排除来自“历史与数目”的干扰的时候,单纯地弘扬一种地域的什么追求和单纯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一样都不得不是抽象的和苍白无力的。在今天,认识地域首先意味的还是认识我们自己,进入地域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如果对地域的认识可以在一个特殊的方向上推动我们摆脱对于外在权威的盲从,从而寻找自我,发展自我,那么这才是有意义的,而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思考地域,解释关于地域的种种文化与文学现象,那显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探索绝不是坐井观天的画地为牢,而是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来解答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相关问题,最终是为了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实际问题作出一些新的独特的解释,中国的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目标,进入大西南,最终是为了走出大西南,进入和走出都不过是一种方式,它的最终指向还是中国新诗,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的

深层部位。当然,不对大西南诗歌本身的诸多问题作必要的梳理也无法进入到问题的实质。

在全面展开“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这一充满时空意义(时间:新时期;空间:大西南)的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基本的时空概念作一个基本的界定,以有利于我们讨论的进行。

就空间概念而言,我们所谓的“大西南”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南”包括云贵川(渝)三省,广义的“西南”的范围则很大,除云贵川外,它将西藏、广西也纳入其中,甚至还涉及到湖南的西部、湖北的西南部及青海的藏区等地域。因为,在严格的民族学与地理学的意义上,“‘西南’一词,是指百越、氏羌、苗瑶三大族系各民族文化的稳定流播区,以及包括孟—高棉各民族文化在我国境内的实际流播部分。”^①而上述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都属于这些文化的流播区域。但是,就我们课题所涉及到的文学创作又主要是诗歌创作这一现象来说,能够在新时期在全国性的意义上产生影响的地域则显然没有这么广大。在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上,产生着全国性影响的主要还是以四川(包括重庆)为中心的云贵川三省,因此它们无疑将成为我们讨论的重心,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大西南”基本上是取其狭义。只是,考虑到在新时期同样存在着一些诗人进入西藏或从西藏汲取创作灵感这一重要的事实,考虑到他们这类创作的实际成就,特别是其投入地域的动机与我们论题的一致性,我们也有意识地将这一部分内容纳入了进来。

就时间概念而言,今天学术界一般将 90 年代的到来作为新时期文学基本结束的标志(更有明确地以 1989 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终结),这一时间长度也大体上体现了新时期中国诗歌对于

^① 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导言.见:西南与中原.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4页

大西南的关注以及大西南诗歌自身的个性展现历程,这也就是我们将讨论定位在“新时期”的原因。事实上,我们这一课题也正好可以成为中国新诗的那一段永难再现的激动人心的岁月,成为那一段岁月中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行为的庄严的祭礼!当然,就像我们中国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并没有因为新时期的终结而宣告结束一样(虽然它的确有了与新时期十分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新诗仍然在继续着它的历史轨道。90年代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诗歌运动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诗人的生存状态,或者干脆让他们停了笔,但是其中的一些执著的诗人还是在以各种方式探寻着自己的艺术之路,并力图进入到更为广大的艺术领域。有鉴于此,我们的研究也顾及了这些诗人在90年代初的诗歌创作。

愿我们的描述能够部分地揭开大西南与大西南人的神秘面纱,并最终有利于我们对新时期中国诗歌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

目 录

1/ 引 论

1/ 第一章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

新时期的“归来”：西南与中国——大西南“新诗潮”的独特选择——“第三代”与大西南——新时期诗歌的消歇与大西南的教训

21/ 第二章

“你红颜色的泥土滋养了我们”

——中国新时期诗歌中的大西南意象

大西南的“理念”——怅望大西南：边地与家园
——走不出的封闭：大盆地及其他

81/ 第三章

大西南精神之一：

反叛激情与先锋意识

“新诗潮”的先驱——“寻根”在西南的新变——
“第三代”的策源地——来自地域传统的支持

131/ 第四章

大西南精神之二：

生活、口语与调笑

“流沙河”归来”后的启示——“莽汉”的文化拆墙
——“非非主义”的游戏——悲剧化的人生与生活化
的人生：在大西南与大西北之间

188/ 第五章

大西南其他诗人与诗人群扫描

“女性诗歌”诗人群——翟永明——海男——傅
天琳——唐亚平——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少
数民族诗人吉木狼格——何小竹——于坚——张新
泉

284/ 后记

第一章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 诗歌的消长

如果我们将 90 年代的到来视作中国文学“新时期”的基本结束,那么经由“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洗礼而出现的中国新时期诗歌显然经过了一个萌发、演进、壮大又消歇、转换的运动过程。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当然与新时期中国文化的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却有必要看到大西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别有意味的表现:大西南诗人不仅迅速地汇入了归来的“合唱”,而且在以后的浪涛翻卷的“新诗潮”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我们中国新时期诗歌在 90 年代市场经济冲击下所呈现出来的某些低迷与消歇的姿态也在我们的大西南获得了比较明显的表现。这就启发我们,在考察中国新时期诗歌消长规律的时候,除了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角度加以思考之外,对于像大西南这样的极具典型意义的区域文化的重点研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路。对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大西南现象或许是一个“个案”,但这却是一个包容了众多普遍性的“个案”,况且它还不是简单地包容了这些普遍性,甚至还因为有区域因素的存在而使得某些文化现象获得了更清晰更坦白的表现,也就是说,进入大西南,我们不仅可以对大西南诗歌与大西南文化本身进行检点、梳

理,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独特的角度上对整个中国新时期诗歌的演变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新时期的“归来”:西南与中国

大西南诗人在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之初所表现出来的果敢与投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当时引起诗坛关注的诗人中来自大西南的就有好几位,如:

李发模,一位原籍四川,生长于贵州农村的 60 年代诗人。他于 1979 年以《呼声》再次引起了诗坛的关注,被称为是“伤痕文学”在诗歌中的代表。

流沙河,一位在 1957 年因《草木篇》而获罪的四川诗人,以浓厚的“自叙传”色彩的创作抒写着人生的沧桑,不仅如此,他还以对新诗理论的再构和对台湾诗歌的介绍而饮誉诗坛。

周良沛,一位原籍江西,却一直生活在云南的诗人,一方面为我们奉献了他的诗歌作品,展现了一位“灵魂的流浪者”形象^①;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中国新诗史的整理和钩沉,在对众多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灵魂的流浪者”的打捞中,不断擦拭出中国新诗的应有的光彩。

在四川,可以数出的“归来者”尚有孙静轩、梁上泉、雁翼、木斧、杨牧、王尔碑、傅仇、杨山、沙鸥、石天河、白航、陆荣……

在云南,还有晓雪。

在贵州,则还可以包括罗绍书、廖公弦……

显然,这一大批“归来者”的存在充分地体现了大西南诗坛

^① 周良沛,雪兆集·自序。见:雪兆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在新时期的某种繁荣与宏富,然而,我认为若苛刻论之,这样的繁荣与宏富却又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诗歌史价值。因为,平心而论,将出现在大西南的“归来之歌”与当时整个中国诗坛的声音相比较,前者的光芒显然将被后者所掩盖,而这种掩盖倒并非是因为地域的偏远而阻碍了传播,而是有着更加深厚的艺术自身的渊源。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诗坛的“众声喧哗”之中,大西南诗人的声音并不比其他的区域更突出、更特别,大西南诗人的创作个性也并不比其他区域的诗人更鲜明、更引人注目。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
远得就像冥王星的距离,
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

流沙河的这首《归来》虽然凝结着诗人那宝贵的辛酸体验,然而,在我们的诗歌史上,这样的体验却又往往与其他几乎所有的中老年诗人的“归来意绪”相互说明,“成为复出的诗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的典型心态和诗情核心”,^①属于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要降低流沙河等西南诗人的意义,然而,从诗歌史的角度,频繁地为我们所提及的的确还包括了艾青、公刘、邵燕祥、白桦、叶文福、蔡其矫、牛汉、昌耀。作为这一诗潮经典的则有艾青的《鱼化石》、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蔡其矫的《珍珠》、公刘的《沉思》、牛汉的《华南虎》、昌耀的《慈航》等等。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这种大合唱时代对某一部分个性的

①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69页

某种遮掩又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因为，导致这一“合唱”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曾经有过的对个性的抹煞和剥夺。当个性的丧失和自我的泯灭在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已经为人们所“习惯”、所“认可”，那么陡然而降的自由在一时之间倒并不容易为所有的人所适应了。

对于大西南“归来”诗人群的认识似也可作如是观。众所周知，这一批诗人的最初出现是在 50 年代，那时，在我们的中国诗坛上，就引人注目地诞生了两大可以以地域命名的诗人群体，一是“西南边疆青年诗人群”，包括公刘、白桦、顾工、高平和周良沛，再就是“四川青年诗人群”，包括雁翼、梁上泉、傅仇、孙静轩和流沙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南诗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当时中国的其他区域“输入”的，如周良沛来自江西，雁翼、孙静轩来自山东。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由当时中国文学的“大一统”准则塑造而成的，其他来自四川的诗人如傅仇、梁上泉、流沙河又都是在这样一种准则规范下的四川生长起来的——当整个中国都处于抑制和取消人的个性追求之时，诗人的独立品格实际上就很难得到鼓励和发展了。

考察新时期的“归来”的诗人群，我们不得不充分重视这一历史背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归来”诗人而言，他们被允许“复归”的个性也就是 50 年代那种被限定了的个性。就是说，其个性伸展的空间已经“先天性”地受到了压缩。在整个中国的范围来看，这一诗人群中的一些成就突出者如艾青、牛汉等恰恰在 50 年代之前就已经奠定了自己的个性的基础。

西南“归来”诗人群整体个性的某些遮掩事实上也直接体现为其西南文化特征的模糊。

从本质上看，真正的地域文化特征（而不仅仅是某些地域风物的刻绘）实际上就是与人的个性独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

人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才审视着周遭的生存环境,是人为了更自觉地发展自己才将自己的心智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地域。当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的独立价值之际,事实上也很难在整体上形成某一个地域的群体优势和群体个性。

大西南“新诗潮”的独特选择

追踪新时期中国诗歌的轨迹,我们发现,是西南“新诗潮”诗人的出现才第一次展示了这一地域的异于他者的独特性,而这样的独特性也就有了几分耐人寻味的东西。

提到“新诗潮”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1979年的《诗刊》。正是在这一年,《诗刊》乘着前一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新潮”诗歌,使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今天》派的追求浮出水面。1979年第3期上是北岛的《回答》,这是新诗公开“崛起”的第一个作品,第4期则有舒婷的《致橡树》和重庆诗人傅天琳的《血和血统》,第5期是重庆诗人骆耕野的《不满》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接下去几期还发表了徐敬亚的《早春之歌》、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歌乐山组诗》等,这些诗人和诗作与第二年更具声势的“青春诗会”作家作品一道,展示了刚刚涌现的“新诗潮”的可观的阵容。

就在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新诗潮”诗人中,属于西南地区的傅天琳、李钢、骆耕野、叶延滨显然具有与许多同时代人所不一样的特点。

如果说对苦难历史的回顾和叩问是这一诗潮的共同的追求,那么这一追求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却有着并不相同的形式。

例如，都是对现实境况的不满，北岛的《回答》是尖锐而沉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而骆耕野的《不满》则要平静温厚一些：“我不满官僚主义，/轻浮地荡尽了先烈的遗产，/我不满文化水平，/至今还托不起四化的航船；/我不满软弱的法制，/英雄碑前有民主的泪浸血染；/我不满大话和空想，/睡在海市蜃楼上描绘缥缈的明天；/我不满抱怨和牢骚，/躺在时代的堤岸上指责涌进的波澜……”在北岛那里，批判的冲动凝聚为一种高度浓缩的情绪体验，正是因为情绪的浓缩，才造成了《回答》的表述上的铿锵有力，仿佛每一句每一行都凝结了无限的精神的能量；相反，批评在骆耕野这里却化作了当代社会具体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罗陈和揭露。

骆耕野的这种批评的“实在”在当时同样可以从傅天琳、叶延滨那里读到。

叶延滨对苦难历史的咀嚼最后诉诸于他对陕北“干妈”的追忆，较之于艾青早年《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成名作，《干妈》更有一份写实的细腻和朴素：

也许，用诗来描绘这太粗俗的事，
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诗人。
但，我不脸红——
我染上了一身的讨厌的虱子，
干妈在灯下把它们找寻。

妈妈，我远方“牛棚”里的亲妈妈呀，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儿子多幸运，
像安泰找到了大地母亲！

我没有敢惊动我的干妈，
两行泪水悄悄地往下滚……

傅天琳最早发表于《诗刊》的《血和血统》，也立足于一件坚实的“本事”：“十二年前，/为抢救工人兄弟的生命，/一个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年，/毅然挽起了衣袖”。关于血统论，诗人发表了在当时看来是大胆的质疑和控诉：“血呵，你能救活一个工人阶级兄弟的生命，/为什么——却不能属于这个阶级？……”与她的同时代人如舒婷一样，傅天琳仍然对祖国怀着“儿女”一样的忠诚和依恋：“中国，决不是‘四人帮’的中国，只有实践，才能检验血缘。/我浑身轻松，投入四个现代化的战斗，/恨不得向祖国交上一千个果园！”（《果园之歌》）这种感情多少也让我们想起了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然而，仔细品味，我们也能感到，舒婷的赤诚和北岛的批判一样，依然是情绪性的直写，与傅天琳不同，她的诗情似乎并不依托某一具体人生的“事件”：

我是你河边上那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呵！